



旷野呼告

КЬЕРКЕГОР И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俄】列夫·舍斯托夫 著
方珊 李勤 译

旷野呼告

【俄】列夫·舍斯托夫 著 方珊 李勤 译



华夏出版社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旷野呼告/(俄)舍斯托夫著;方珊,李勤译.-2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ISBN 7-5080-1653-X

I. 旷… II. ①舍… ②方… ③李… III. 舍斯托夫(1862~1938)-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IV. 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899 号

责任编辑 高煜玲 褚朔维

装帧设计 陶建胜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75印张 200千字

1999年1月北京第2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80-1653-X/B·100

定价:12.8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总 序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累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方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思想名著,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如同读者所知,现代西方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深层转变而日益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的创设,恰好立意在接续先贤传译西方思想经典的伟业,为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或食粮,以期看到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在荆棘与鲜花并

见的求索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选译的著作，在力求反映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独创性与思维深邃性的同时，尤其注重思想的全面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现代西方的思想佳作，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广义人文科学，无论是既已成为主流学派的名家大作，还是依然在支流思潮中涌动强劲的新秀新作，无论是以思想观念的独创性而特立独行于人类思想史的“义理之学”，还是将研究方法的更新变换纳入漫漫思想长河的“考据之学”，凡此种种无不在搜罗之列。我们的译介，尤其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以研究探索性翻译为译事所追求的目标；“勿以译为讹为托言”，应当成为我们以及我们的译者们的座右铭。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既是一项恢宏繁复的工作，也是一份至为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此项事业发展的旅途上，我们首先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关注这一文库的读者们。同样，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养料或食粮的思想家们以及把这些材料传译过来的人们。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我们的期盼中将会扶助并参与到此项事业中的人们。

谨此为序。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理性与信仰

方 珊

信仰就是战胜自明性，也只有信仰才能推倒我们身上漫无节制的原罪重负，让我们能重新挺直腰“站起来”。这样一来，信仰就不是对我们所闻、所见、所学的东西的信赖。信仰是思辨哲学无从知晓也无法具有的思维之新的一维，它敞开了通向一切可能性之本源的道路，敞开了通向那个对他来说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不存在界限之人的道路。

舍斯托夫

无论如何，舍斯托夫都不能算作当代赫赫有名的经典哲学家之一员。那些屈指可数的、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早已在学术界树立起自己

的声望，并在哲学史上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应有地位。可舍斯托夫无论生前还是逝世之后，都似乎未名满天下。初看起来，似乎是由于舍斯托夫没有鸿篇巨制，又没有建立庞大的哲学体系。不仅如此，而且还很难把他归属于某个哲学流派。一个哲学家如果不是某一哲学流派的先驱，奠基者或者著名代表，是很难声名显赫，名震四方的。一些人把舍斯托夫划归于存在主义或存在哲学，这种简单而幼稚的归类办法掩盖了哲学家的独特个性，尤其像舍斯托夫这样独具慧眼、极富独创性的哲学家更是如此。

舍斯托夫是一个毕生反对思辨，提倡启示，反对理性，推崇信仰的哲学家。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俯首听命于理性真理的强制性，并且在理性的自明之中去寻找法则和原理。他们深信，只有理性才有力量来回答困扰人类灵魂的一切问题，只有理性才能找到永恒真理，只要理性才有哲学的立足之地。理性似乎握有决定一切的无上权威，似乎只有理性一下命令，人就只有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而且还必须心甘情愿、崇敬备至而低首下心地无条件服从。

理性、自明就像墨杜萨^①的头，只要谁胆敢冒险去看上它一眼，就会立刻使之意志麻痹，失去感知而变为顽石。面对这样一个超出人力之外的庞然大物该怎么办？难道无论它向我们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接受，都必须屈从，都必须信奉？难道无论它向我们宣告什么，无论我们需要与否，也不论我们愿意与否，都必须敬如神明吗？难道就是它在侵犯我们一切最宝贵的东西，侵犯我们视为神圣的一切东西时，我们也只能绝对服从，束手待毙？这里面有否疑问，有否值得怀疑的东西？几千年来，人类的优秀代表——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哲学家，都

① 希腊神话中三名戈耳工之一，据说原来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变得奇丑无比。谁只要看一眼，就会变成石头。

在竞相以不同的方式作着反省。对理性的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怀疑，他们一致认为，人类得到理性之光是人类最大的福祉。要是谁去问这样一个问题：理性是怎样获得这种决定人类命运的无上权威的？那就会遭到博学多识者的群起而攻之，他就会被人们视为愚蠢无知和疯狂，而人类畏惧愚蠢和疯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都厉害。

就是在这人人都畏惧万分，个个都视为自明的真理的地方，舍斯托夫开始了自己的学术活动，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斗争。

一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古希腊人的文化之上的。如果没有希腊人的聪明智慧，或许就会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因为，只有希腊人发现了逻各斯、奴斯、必然性诸如此类，才为我们带来了哲学，不仅奠定了一切后来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究的所有问题和答案。

苏格拉底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观念、思想统治了西方文明达两千年之久。当然，苏格拉底之所以被人们尊奉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并非是因为苏格拉底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体系，也不在于苏格拉底以其一生从事的事业激发起人们对真理的爱和对德性的追求，而是由于苏格拉底首先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全力维护知识的权威，如果不毫不留情地摒弃以信仰为基础的“偏见”，那么，我们人类的思想 and 知识就会像建立在沙丘上的大厦，只要略微一推就会立刻倾覆、倒塌、破碎。因此，他以重建真知识为己任，使人类的知识大厦免于崩溃，从而在人类历史上树立起自己的丰碑。

尽管有人认为，苏格拉底大义凛然，饮鸩而死，是追求真理而献身

的圣人,但实际上,苏格拉底并非是寻求真理,而只是寻求事物的普遍定义:“意见”可以纷繁多样,而“真理”只能是一个;“意见”可以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理,可以随时而变,可“真理”却永恒不变,亘古长存。这种普遍、确定、永恒的真理并非他物,它实际上就是大家必须遵守的原则,共同依据的基础,是根据公认的论点进行推理,达到公认的命题,是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的一致处抽绎出普遍的判断,引申出定义,获得清晰明确的概念,例如知识就是至善,美德就是智慧等等。所以,苏格拉底的知识只涉及一般和普遍,而不涉及个别和偶然;他的真理只是逻辑推论的结论,而非人类应当寻求的真正的真理。他拥有的法宝是概念的知识 and 获得这种概念知识的“助产术”。因此,苏格拉底的丰功伟绩在于,他树立了对理性和为理性所获得的知识的一种信仰。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哲学家所崇拜的古希腊的伟大人物。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接受了苏格拉底的信仰——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真正的知识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种知识知道自己是唯一的真知识,因为只有它,才能确认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假知识。柏拉图认为,知识的真理性保证就在于,知识是思想同实在或存在的一致性。真理就是关于实在、存在本身和实际存在的知识。真实的存在是常驻不变和亘古永恒的东西,而流动不居、千变万化、个别偶然的的东西,决不能提供真知识。概念的知识正是揭示事物的一般、不变、基本的因素,因此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正在于认识这种不变、永恒的东西。

柏拉图认为,宇宙之所以美好、合理和有目的,全仗理性这件法宝。理念世界本身就应被视为是一个有秩序、有理性的宇宙。处于最高的理念是善的理念,它是一切理念的泉源,也就是逻各斯,是存在之根,宇宙的最终目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用逻辑思维来理解它的内在秩序和法则,思索它的本质。只有理性才具有绝对的价值,只有理性

才是至善。无限的东西只是理性和真理。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缥缈的东西。正如柏拉图著名的洞喻寓言一样，人如果没有理性之光的指引，只能在黑暗的洞穴里见到事物的不真实的、虚幻阴影，并为这些虚幻阴影所迷惑。只有当人受理性之光的指引，走出洞穴，摆脱迷惑，才能得到真理，才能见到太阳。因此，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是那些爬出洞穴，看到了永恒不变事物本身的人，也就是追逐知识，喜欢看到真理的爱智者。

柏拉图的洞喻寓言简直就像是一面能照亮每个人灵魂的镜子：只要有人试图否定知识，反对理性，拒绝思考普遍必然的理性真理，那这个人就将终生不幸，他也就必然要在黑暗的洞穴中，为虚幻的阴影所迷惑，一辈子作孤独、受人嘲笑的洞穴人。对于生活在尘世间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怕、更不幸的事情吗？那些凡夫俗子，不必说是十二分的畏惧，就连那些视死如归的伟大英雄，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窒息、备受禁锢、暗无天日的洞穴生活也会不寒而栗。

人们得到柏拉图的谆谆教诲之后，已经别无选择：是做哲学王还是作洞穴人？是喜欢理性还是憎恨理性？是过人人想过的享有太阳和真理的幸福生活，还是沉沦于孤独绝望的洞穴生活？不言而喻，只有沿着柏拉图指引的路走，才是有理性的正常人，否则，就是无知的和疯狂的反常人。

可是，谁能保证听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呢？怎样才能使概念的知识成为唯一的真知识，甚或摇身而变为人类应当追求的真理呢？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天才：一方面，他把哲学变成研究事物根本或初始原因的科学，变成研究本然的存在，认识其理由，根据和必然如此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这位先哲又把逻辑学变为哲学的导论，使逻辑成为我们区别真理和谬误的标准，从而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重要使命，获得了后世哲学家的尊崇。

亚里士多德一再告诫我们，理性是神圣的，人有理性活动才是最高尚的幸福。因为合乎理性的生活才是人类应当如此的生活，也才是神圣的幸福生活。哲学包括一切经过理性思考的知识，它就是要帮助人们去正确地思维，去过正当的生活。

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贤哲为我们高筑起一座大厦，这是一座由理性为基础，以逻辑为工具，以永恒真理为目的的知识大厦，它有必然性作为自己的坚固不破的城墙，它企图凌驾于一切之上；它傲视芸芸众生，蔑视有限和偶然。自此以后的思想家和贤哲们大都是在对这座大厦或者修修补补，或者添砖加瓦，就连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直到胡塞尔等都莫不如此。他们口口声声扬言要探索真理，其实质不过是追求公认的判断，都不过是在向知识、必然性和理性表示自己的俯首听命、爱似奴隶般的忠诚，诚惶诚恐地匍伏在地，甘作石墙的垫脚石。

二

然而，西方文明还有另一个来源，那就是《圣经》。

《圣经》中的“创世纪”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上帝所造，上帝的创造行为是一切美、善的保证和唯一的源泉。正因为一切为上帝所造，世界上的一切才完美无缺，既无恶又无罪。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上帝的伊甸园里，纯真至善。上帝在伊甸园里种了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他告诉人们如接触知识树之果就会死去。但诱惑者蛇却说：“不会死的，而且会使你们睁开双眼，会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于是，无知的人接受了诱惑，尝了禁果，睁开了双眼，懂得了善恶，由于人睁开了双眼，知道了善恶，罪孽就与知识一起进入了世界，恶亦接踵而来，人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不得不生活在不能不存在恶的世界中。

可是，又有谁能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呢？几千年来，人们只是把它当作神话或传说故事，并且认为《圣经》必须由理性来作出解释。《圣经》中的那些伟大奇迹：死人复活，癫痫病治愈，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瞎子复明，哑巴说话等等；所有这些只是说明一点：上帝无所不能。一切奇迹的源泉就在于信仰，这是一种敢于不求理性证明，也不求助任何证明的信仰，只是对上帝的一种真诚信仰。

那么，究竟是应当信仰上帝还是应当信仰知识？是跟着上帝、先知漫无目的地步入乐土福地，还是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之后尘在知识里寻求永恒的拯救？换言之，是到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学说里去寻求思辨的真理，还是到《圣经》中的上帝那里去寻求启示的真理？这就是舍斯托夫在研究了哲学史和《圣经》之后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困扰他一生并使他力图解答的最重要的问题。

舍斯托夫认为，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位卓绝超群的思想家，尽管他们都生活在黑格尔主宰欧洲思想界的年代里，但并未被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所迷惑，而是从《圣经》中去获得力量，竭尽全力挣脱知识的支配，与思辨真理及把“启示”归于认知的辩证法进行殊死的搏斗。

舍斯托夫一生都极为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开端与终结》、《在约伯的天平上》以及本书中都论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舍斯托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期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但由于苦役和地下室的生活，使之产生并长久地恪守着对上帝的强烈渴求，获得了常人不曾有过的新颖而可怕的经验，由此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萌发了伟大的、用生命和死亡来进行的斗争。因此《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待世界。他发现，人类经验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一界限是由坚不可

摧的自然规律、永恒法则、数学原则等决定的，它们就像一堵石墙，禁锢着人们，使人们犹如生活在令人窒息、使人受到束缚和蔑视的地下室里，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人摆脱自己“无期监禁”的地位。处在理性所辩护的世界里，思维健全的人讲述的是大家需要和有用的东西，表达的也是适用于大家的判断，好像命中注定是在地下室里生活，并在这种必然存在中进行论证、理解，似乎石墙和地下室是某种有着令人宽慰、给人安定感和永恒确定性的东西。

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天才的敏锐目光看到了康德和黑格尔这些大哲学家所意识到的普遍必然判断，但他并未像康德那样去为理性辩护，用实用科学来评断哲学；恰恰相反，他要用哲学去评断实用科学，他对理性所揭示的自明性感到极其恐惧不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远比康德更为深刻的问题：与人毫不相干的石墙和二二得四为什么能支配活人的命运？它们是从何而来，又是谁赋予它们这种统治人的无限权力？思辨哲学把这些东西奉为终极真理，当作梦寐以求的和敬若神明的东西，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发现它们荒唐透顶、愚蠢至极。他开始摆脱那种大家都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东西，抛开了理性的引导，不仅不去接受理性的真理，而且还竭尽全力攻击它，要用脑袋去撞开这堵石墙，即便是撞不开它，也不能向它妥协，无论会遭到怎样的指责、排斥、屈辱、鞭打、摧残，也在所不惜，走出地下室，离开“全体”注定生活于其间的洞穴，脱离由规律、原则、自明对人统治的迷宫，摆脱“正常”人的“理想”王国。

康德尽管写了《纯粹理性批判》，但他不敢批判理性，并且还想把形而上学变为数学、自然科学一类的精确的“实用”科学。事实上，康德的批判只是表达了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坚定不移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永恒原则是没有的，这个原则得以支撑的、有充分根据的规律，仅仅是钟爱自己和把自己奉为神明的

一种自我暗示，他为自己头上和整个世界笼罩着纯粹理性的可怕的统治而感到痛苦，也为自己与大家、“全体”、法则、理性的对立而深感绝望：永远呆在地下室，并且相信地下室的生活才是人的真正生活，最高的生活，把地下室视为唯一现实的、唯一可能的世界，把判定一切是好还是坏，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至高无上之权交付理性，毫无疑问，这是非人的待遇，是令人害怕的，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反对的。

另一方面，逃离地下室，用头撞开石墙，把自己与全体对立，要反对理性，反对自明真理又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要知道，在永恒真理面前，牲畜和造物主都一样要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能不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一个人只有跟着大家走，并赞同人所共遵的判断，只有服从理性，得到严格不变的秩序的支持才能够活着。要是他擅作主张，敢作敢为，摆脱“全体”，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说自己的真话，表达自己的怀疑、痛苦和绝望，就会引起人们的愤怒；就会被永远逐出正常人所组成的共同世界而终生孤寂，陷于绝望的深渊。因为，谁要忽视理性法则和基于理性之上的科学，谁就不能不受到大家、良心、科学和理性的惩罚。

可是，难道那些至死不渝都在崇敬理性、科学和自明真理的人就不应受惩罚吗？这些人生前就已漠视个性，无视个体存在，把自我变成了无意志、无情感的自动机，人性遭受扭曲甚至泯灭，变成了受别人或别的东西所操纵的非人，死后也是永恒原则的祭品，这种人被偏见所蒙蔽，至死都把谎言当真理，把非人生活永恒化，岂不可悲可怜？这难道不是惩罚吗？与其行尸走肉般活着，苟延残生，不如奋起反抗，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向墙和二加二得四的妥协是不可能的，凡是已有的现成结论和法则，即便是常识和科学所提供并由理性加以证明的东西，也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他懂得了，知识不仅不把人引向

自由，反而奴役和束缚了人。于是，他就到《圣经》里去寻找启示，以反抗自明。

正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敢于面对痛苦、敢于正视绝望和濒临深渊的绝境，才产生了巨大的恐怖，也才有了超自然的灵魂紧张。因此，舍斯托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揭示出人的灵魂深处的呼告：向墙妥协不可能，用脑袋撞墙又是力所不及，世上有没有力量使人穿越石墙？我们应向谁呼告？而这种从绝望的深渊向上帝的呼喊就成了存在哲学的基调，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的主旋律。它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全部作品的源泉。他的《白痴》、《群魔》、《卡拉玛佐夫兄弟》，甚至垂暮之年的《作家日记》等一系列著名作品，都是对早期作品《手记》的广泛注释，到处可见启示真理与思辨真理的连续对质，都是为了克服自明，战胜思辨哲学，摆脱理性所作的灵魂拷问。

三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没读过黑格尔的著作，是不自觉地与黑格尔思想进行斗争，那么，克尔凯郭尔却是熟谙黑格尔的著作，完全有意识以战胜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生存的使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克尔凯郭尔青年时期曾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在经历了漫长艰难的内心斗争之后，才憎恨、鄙夷黑格尔。但克尔凯郭尔一生也未摆脱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的阴影。他遵循命运的支配，感到自己完全处于他的理性如此渴求的必然性支配下，才开始理解《圣经》关于人类堕落故事的深奥和使人震惊的意义。这样，克尔凯郭尔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有力而狂热地表达了存在哲学的基本思想，两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探寻真理的方法上，都不无相似之处，并都同思辨哲

学对立起来。两人都是抛开了黑格尔而走向《圣经》，走向特殊思想家约伯的。因此，舍斯托夫声称，可以毫不夸张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克尔凯郭尔第二。

黑格尔深信，《圣经》之蛇并未欺骗人，知识之树的果实是一切未来哲学的源泉。历史证明确实如此，知识之树的果实的确成了哲学之源，一切未来思想之源。不仅反宗教的哲学家，就连多神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哲学家都希望自己成为知道善恶的人。他们都认为，只求在禁树之果中寻找永恒的拯救，只应在理性中寻求真理，只有理性承认为真理的才是真理。理性真理就是永恒真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和顺从。《圣经》也必须由理性来解释，凡是理性难以证明的不可能和奇迹等东西都必须摒弃。一切都必须由理性来证明，凡能在我们理性面前证明多少，能为我们睁开的双眼看到多少，才能被我们接受多少。因此，黑格尔的名言“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只是说明一切只能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它并非黑格尔的独创，不过是近代哲学之父、杀死上帝的元凶斯宾诺莎之名言，“non ridere, non lugere, ne que 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的意译。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哲学绝不是心灵的纯智力活动，哲学的基础也绝不是像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教诲的那么惊奇，而是绝望。他的《重复》、《非此即彼》、《恐惧与颤栗》和《恐惧的概念》等书写的都是这个主题。

克尔凯郭尔谈到，要与举世闻名的导师分道扬镳，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铤而走险，发扬大无畏精神才有可能去反对伟大的导师。因为他虽然英明伟大、通晓一切，是人类天才，然而“天才处处揭示天命，他愈天才，揭示得就愈深刻……尽管天才的存在光辉灿烂，意义深

远,但这是罪孽。对此要有勇气才能理解。”^① 英名流芳千古,被人们顶礼膜拜奉为救星的天才,由于他把手伸向了禁树之果,由于他助长了“将像上帝一样知道善和恶”这一无法实现的贪欲,由于他把空泛的虚无变成了必然,使之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任意宰割了人自由的意志,使任何敢于凝视它的人石化;由于他神化了理性、伦理、永恒和无限,漠视了人类的苦难、悲哀、诅咒等一切偶然、有限的个体存在,他就成了人类最大的罪人,成了人要获得自由的死敌。那些扰乱人类灵魂不安的问题,天才是不屑一顾的,天才高瞻远瞩的是那些雄踞于一切有限和暂时之上的东西,他要求人们只去“理解”,让人受永恒普遍和亘古不变的原则所支配。由此,克尔凯郭尔离开了黑格尔,奔向了唯一的救星——《圣经》中的约伯和亚伯拉罕。

克尔凯郭尔在伟大导师的哲学里感受到了一种致命的谎言和可怕的诱惑,即对主宰一切、并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真理的俯首听命,把我们毫无限制的自由和无限可能性的信仰去换取知识和理性、换取对僵死的永恒原则的奴隶般的信赖,难道这不是一种最可怕的堕落吗?当克尔凯郭尔转向先知和《圣经》,他却发现了思辨哲学不曾谈到也不可能谈到的东西。先知说,“遵守教规者以信仰为生”,“一切非信仰皆有罪”。信仰向他指引了生命之树,生命之树的产生不是知识,也不是思辨哲学,而是存在哲学,存在哲学源自生命之树。这样,克尔凯郭尔就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存在哲学,并与源自知识之树的思辨哲学相对立。

舍斯托夫认为,克尔凯郭尔对存在哲学避免定义,因为克尔凯郭尔学习了苏格拉底的接生术方法,不是为了建构哲学体系,而是去帮助人们发现真正的真理,所以他采用“间接表述法”,亦即通过第三者

^① 克尔凯郭尔:见本书第八章。